

懒寻
旧梦录

他日之安



中華書局

夏
衍
著

懒寻 旧梦录

(增订本)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懒寻旧梦录/夏衍著. —增订本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6.1
ISBN 978-7-101-11205-4

I. 懒… II. 夏… III. 夏衍(1900~1995) - 回忆录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5328 号

书 名	懒寻旧梦录(增订本)
著 者	夏 衍
责任编辑	余佐赞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	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 $\frac{3}{4}$ 插页 4 字数 420 千字
印 数	1-6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11205-4
定 价	48.00 元



1924 年在日本留学的夏衍

1924 年于夏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，这一年他会见了两位重要人物。1924 年春，他和蔡经铭一起去拜访了当时寄寓在博多的郭沫若，开始了郭夏的终生友谊；1924 年 11 月，他和友人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在门司谒见了孙中山，并在孙中山面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。

从前心事都休，懒寻旧梦。
肯把壮怀消了，作个闲人。
——张炎宋词见赠联

夏衍手迹

夏衍说：“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：‘从前心事都休，懒寻旧梦；肯把壮怀消了，作个闲人。’我非常欢喜，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。”

向电影事业的前驱者

夏衍同志表示敬意！

邓颖超 1985年



贺辞与合影

1985年12月16日，为纪念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五十五周年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电影学院在京联合举办了“夏衍电影创作与理论研讨会”，邓颖超、习仲勋等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祝贺。上图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贺辞，下图为夏衍与习仲勋（左二）等人合影。

庭前垂柳
珍重待春風

生活情趣：写九

“写九”是文化味很浓的习俗，往往用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”或“春前庭柏風送香盈室”，先双钩成幅，从头九第一天开始填写，每笔一天，九字填完正好八十一天。此幅为夏衍某个冬天“写九”的字幅，用钢笔书写，一笔一天。

出版说明

夏衍（1900—1995），原名沈乃熙，字端先，浙江杭州人。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，1920年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，1921年入明治专门学校（今九州工业大学）学习，获工学学士学位。读书期间，夏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。1919年“五四”期间参加学生运动，后参与创办进步刊物《浙江新潮》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曾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。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，后担任国民党驻日神田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。

1927年夏衍回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及革命文化翻译工作。1929—1930年间参与筹建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、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”，任“左联”主席团成员、执行委员、常务委员。1933年2月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。1935年发表短篇小说《泡》，第一次署用“夏衍”笔名。1937年后，在上海、广州、桂林、香港、重庆等地主编《救亡日报》、《华商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报纸。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。1947年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，返港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成员，香港工委委员、书记。1949年4月到北平，后入上海，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。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。

建国后，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、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、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、上海市文化局局长、上海市文联主席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影协党组书记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夏衍受尽折磨，锁骨、腿骨均被打断。1977年平

反后恢复工作，历任政协常委、文化部顾问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、中顾委委员等。

夏衍是著名文学家，电影、戏剧作家，文艺评论家，翻译家；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、组织者，同时在外交、统战、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。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，也见证了中国 20 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夏衍的回忆录、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，是了解夏衍本人，也是了解 20 世纪新文学运动和 20 世纪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第一手资料，弥足珍贵。为此，我们整理出版了“夏衍自述文字”系列丛书。

此次整理出版，我们的编辑体例如下：

一、本次整理以《夏衍全集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5 年）本为底本，以单行本参校，其中文字有出入处，辩证是非，尽量从作者原意。

二、因资料搜寻不易，《懒寻旧梦录》中所提及的自传文章，如《别桂林》和《走险记》附在正文之后，以方便读者翻检。书前增加了《日译本序（两篇）》，书后将夏衍具体谈及的“两个口号之争”、“上海工作六年”以及“《武训传》事件”三篇专文作为附录放在书后。《夏衍书信》所收共 335 封书信依日期排序并编号；已署年或据附录、注释等可推定年份者，按年分辑，年份不确者编入最后一辑；年份确定而月、日不确者据下限编入；其他情况，保留全集本排序。《夏衍日记》每一时期材料前补充相应背景介绍，正文中部分外文词、人名、地名、专有名词等，为便于读者理解，提供了简要的注释说明。

三、部分作者用字、标点与当下通行规范不合者，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，做了规范处理。文本订正的过程中参考了底本的意见，对脱漏和笔误以〔〕补正，模糊或残缺处以□标示，衍文以【】标出。

四、对文中个别易引起歧义或前后表述不一致处，为尊重原稿，仅以“编者注”形式注出，以示区别。

在“夏衍自述文字”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我们有幸得到沈宁先生的信任和支持，提供了很多作者手迹和珍贵的照片，这些材料做成插页为丛书增色很多；同时，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热心朋友的积极帮助，陈子善老师在得知这套书的出版消息后，积极寻找夏衍散佚的书信，以减少遗珠之恨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5年7月

自序

上了年纪，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，这也许是人之常情。

六十岁以前，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，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，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，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《旧家的火葬》之外，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，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：写文章尽可能“少谈自己”。

我认真地回忆过去，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“监护”之后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，“专案组”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，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止的“自传体的交代”，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，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，就被叫去“问话”，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：“不行，得重新写过，要你写检讨，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。”我记得这样的“交代”前后写过三四次，后来才懂得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是要从“交代”中找到“外调”的线索，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“交代”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，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。这是一种恶作剧，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来不失眠，也很少做梦；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，一入睡就会做梦，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，梦见我的母亲，我的姊姊，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。每次梦醒之后，总使我感到惊奇，事隔半个多世纪，为什么梦境中的人、事、细节，竟会那样的清晰，那样的详细！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，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，而梦境中听到的，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

口音。

当时写“交代”，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，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。那时批斗猛烈，审讯频繁，既不敢说真话，也不能说假话，因为说真话会触怒“革命派”，说假话会株连亲友。全国解放后，我经历过许多次“运动”，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“斗争经验”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，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，不暴露真实的思想。

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，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，那是在一九七一年“林彪事件”之后。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，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，不是说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么，我就利用这一“安静”的时期，对我前半生的历史，进行了初步的回顾。这像是一团乱麻，要把它解开和理顺，是不容易的，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写过的每一篇文章，分辨出是非曲直，那就更困难了。任何人都有主观，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，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，“革命小将”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“我有罪、我有罪”的歌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，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“游斗”、拳打脚踢、无休止的疲劳审讯，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失，真的是应该“低头认罪”了，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，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，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。

从“交通干校”转移到“秦城监狱”之后，获得了很大的恩典，准许看书了，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。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，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，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，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。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不受干扰，可以边读边想，边联系中国的实际。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，而这时候读，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，才觉得“渐入佳境”，别有一番滋味了。

可惜这一段“独房静思”的时间太短了，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，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：“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”，即日解除“监护”。我感到意外，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：“关了八年半，批斗了几年，要解除监护，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。”对方蛮横地回答说：“结论还没有，但可以告诉你，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”这时，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，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，都在等着你，先回去吧，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。

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，当然是高兴的，但在当时，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，审查还没有结论，“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”，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“从宽处理”的“敌人”。监护是解除了，但“监视”则一直没有解除，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，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“小报告”。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，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，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，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，承志的乐观，一氓的安详，给了我无穷的勇气。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居然还活着，这就好！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。”

春天来得很迟，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，七六年一月，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，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，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，我这个人铁石心肠，很少流泪，这一天，我不仅流了泪，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。这又使我回想过去。说实话，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，我是逃不过五七、五九、六四年这些关卡的，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。我静下心来读书，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。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，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，有中国人写的，有外国人写的，有同情中国革命的，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，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、不敢看的书，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。

我没有浪费时间，从“天安门事件”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，我一直闭户读书，从实出发，又回到虚，从看史书出发，又回到了哲学。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，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。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，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，可是现在再读，感受就很不一样了，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，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，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，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！这就是公式主义、本本主义、教条主义，也就是唯心主义。

恩格斯说过：“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，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，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，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。”这里所说的对立面，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。

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，他说：“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，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，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，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，就是说，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，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。……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，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，于是，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。”——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！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，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？就在《自然辩证法》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：“的确，蔑视辩证法，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。”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，我想，我们民族、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。

一九七七年秋，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（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），这样，我的“问题”得到了解决，恢复了组织关系，也真巧，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。

在“文革”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，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“革命文学论战”，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“两个口号的论争”。因此，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“左翼十年”的往事。对前一个问题，我的立场是站在“创造社”和“太阳社”这一边的，但

当时我还不是“文艺工作者”，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，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《中国文艺论战》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；而第二个问题，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，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，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，可是一方面“四人帮”遗毒还没有肃清，“文革”之前、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、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“左翼十年”的文章还在流传，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，那么，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，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、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、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，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，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。“左翼十年”，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，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，现在，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，国内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，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“左翼”文化运动的人，潘汉年、钱杏邨、茅盾、冯乃超、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，幸存者已屈指可数，因此，在一九八〇年纪念“左联”成立五十周年前后，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，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。

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，其实，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，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，从一九〇〇年到现在，八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这个人很平凡，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，实在是太伟大了。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，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，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，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，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，迷失过方向，摔过跤子，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。经过回忆和反思，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，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，

经受过的经验教训，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，供后人参考的必要。亲身经历过的，耳闻目睹过的记述，应该要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“材料”真实一些，但我能够做到的，也只能是“力求”做到而已。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，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，对几十年前的往事，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，具体的细节（时日、地点等等）就难免会有差错；二是“交游零落，只今余几”，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，健在的已经不多，要核实或查对往事，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著中去寻觅了；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，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“为尊者讳”、“为亲者讳”的问题。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，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，大概只占三分之一，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，对此，唐弢、丁景唐、方行、常君实、李子云、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，出了不少的力，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，还承内山嘉吉、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，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“左翼十年”，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，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“讳”、哪些不该“讳”的问题。这一章写完之后，曾请几位“左联”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，作过几次修改，但就在这个“讳”的问题上，意见很不一致。有的同志说：“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，不说也罢，说了会使当事人（或他们的子女）感到不快”；也有人说：“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，‘我们歌，我们哭，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’么，明知其有，而加以隐讳，也就是失真。”惊涛骇浪的“左翼十年”中，这一类事是不少的，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，就是一个例子，一九三六年九月，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，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，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，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，穆木天自己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